

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

陈 春 晓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绿松石”一词,始见于清代文献。但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就发现有绿松石饰品。自此之后,历代不绝,绿松石成为古代中国人所熟知的一种宝石。然而宋代以前的汉文史料,对绿松石的称谓记载并不明晰。虽多有学者进行考辨,仍无法定论。现已知汉文文献中,能明确判定为绿松石的最早记载,是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记“甸子”。此外,宋元明文献中常见与“甸子”相近的称谓,如“靛石”“碧甸”“碧钿”“碧靛”等。这些名称是否亦指绿松石,诸家众说纷纭。以汉文文献和波斯阿拉伯文献为基础,结合现代考古发现和矿物学研究,可以对宋元明时期的绿松石称谓及产地给予考证,并对进口绿松石输入中国的路线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 绿松石;波斯;宋元明;传输路线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1-0141-08

一、释 名

之所以说陶宗仪笔下的“甸子”确指绿松石,是因为他不仅使用了“甸子”这个总称,还记录了三种不同种类的名称:

甸子:

你舍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细。

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荆州石,即襄阳甸子,色变。^①

这三种甸子,除“荆州石”不言而明外,“你舍卜的”和“乞里马泥”所指不确。近代史家多作考辨,布莱特施耐德(Emil Bretschneider)认为:“甸”字可能来自于靛青,而“你舍卜的”“乞里马泥”则

为波斯出产绿松石的两个地方 Nishapur 和 Kirman 的音译^②。此说得到广泛的认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也认为陶氏所记“甸子”就是绿松石^③。地质学家章鸿钊肯定了他们的说法,称:“绿松石即甸子,当无疑义。盖以《辍耕录》有‘你舍卜的’与‘乞里马泥’之名,二者均波斯产绿松石处也。”^④尽管亦有学者对此二名提出其它解释,但皆缺乏说服力而令人难以信服^⑤。

据前人研究现可确知:你舍卜的,为波斯语 Nayshābūrī 的音译,由地名 Nayshābūr + 后缀耶扎非构成,意为“来自 Nayshābūr”或“Nayshābūr 所产的”。Nayshābūr,《元史·地理志》译作乃沙不耳,今译内沙布尔。它是伊朗东北部的一座城市,

收稿日期:2015-09-01

作者简介:陈春晓,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5 页。

②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1, London: Trübner & Co., 1888, pp. 175-176.

③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348—349 页。

④ 章鸿钊:《石雅》卷二,《民国丛书》第二编 88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9 页。

⑤ 如薛克翘认为此二名皆出自梵语,“你舍卜的”来自 nishapati,意为月亮;“乞里马泥”来自 jharimani,意为有裂纹的宝石,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4 页。又如沈福伟认为乞里马泥,不是伊朗的克尔曼,而是塞尔柱土耳其的卡拉曼。乞里马泥,是土耳其绿松石的别称,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7—338 页。

古代以出产优质的绿松石而闻名。乞里马泥,为波斯语 Kirmānī 的音译,由地名 Kirmān + 耶扎非构成,意为“来自 Kirmān”或“Kirmān 所产的”。Kirmān,古代译作起儿漫、乞里弯、乞力麻儿等,今译克尔曼。它是伊朗东南部一省名,也是该省首府之名,亦为波斯绿松石产地之一。多亏陶宗仪记下了这两个译音,才使今人学者得以推定“甸子”即是绿松石。

汉文文献中,除“甸子”外,另见“靛石”“碧甸”“碧靛”“碧钿”“碧淀”“碧瑱”等名称。它们是否是绿松石,诸家意见不一。劳费尔认为“碧甸”“碧瑱”与甸子一样,亦指绿松石^①。然而此说受到地质学家们的普遍质疑。章鸿钊认为中国仅湖北产绿松石,元明文献所载云南和陕西出产的碧钿、碧瑱之类皆应是孔雀石^②。夏湘蓉则根据《读史方輿纪要》中描述碧钿与青绿共生的情况,推断明代陕西兴安州所出碧钿极可能是硅孔雀石;又据昆明工学院对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所出绿松石珠检测后发现多为孔雀石的情况,认为云南会川、安宁的碧甸子当是孔雀石^③。这一结论在此后三十年都颇具影响^④。直到近年,郝用威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质疑昆明工学院的检测结果,并通过化学分析断定古滇国出土的确是绿松石,而非孔雀石,并指出云南安宁禄脰对门山就存在绿松石矿藏^⑤。地质学家的参与,为绿松石的释名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为厘清释名问题,笔者对文献所载我国绿松石的产地作了梳理。根据宋元明文献的记载,碧甸、碧瑱或碧钿等主要产自三个地区。

(一)鄂西北

湖北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绿松石矿区,矿区位于武当山复背斜南北两侧,分布于郧县、郧西和竹山县三地。该地区元代隶属襄阳路,陶氏之“襄阳甸子”当为此地所产。明代张震曾言:“今襄阳出玉石,碧色黑文,谓之碧钿。妇人女子多取之以饰首饰也。”^⑥“碧色黑文”所描述的是一种带有铁线的绿松石,可知襄阳的碧钿当为绿松石无疑。

(二)陕西东南

陕西绿松石矿位于与湖北交界处,实与鄂西北矿属同一矿带,分布在白河、安康和平利县。这一带元时属金州,明万历年更名兴安州。其地出产碧钿、碧瑱的记载很多。《大明一统志》云,金州以西天柱山下有碧钿洞^⑦。顾炎武《肇域志》载兴安州青碌山、天柱山有碧瑱洞^⑧;州下洵阳县有碧钿山、青山,皆出碧钿子;州下白河县有高瑱子洞出碧瑱子^⑨。这些矿址经地质学勘测后可知确实出产绿松石,但夏湘蓉注意到《读史方輿纪要》中关于天柱山有碧钿、青碌洞二十余处的记载^⑩,认为这反映了碧钿与青碌共生的状况。青碌,一般认为是孔雀石,并不与绿松石伴生,而常与硅孔雀石伴生。夏湘蓉亦由此推断此处的碧钿、青碌必然是硅孔雀石与孔雀石。可见陕西东南出产的碧钿、碧瑱,并非都是绿松石,亦有其他含铜类矿石。

(三)云南

云南在古代是否出产绿松石,颇具争议。

①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第349页。

② 章鸿钊:《石雅》卷二,第87—88页。

③ 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北京: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第439—440页。

④ 参见李劲松、赵松龄:《宝玉石大典》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3—1604页;刘诗中:《中国先秦铜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⑤ 郝用威:《诠释元代甸子、突厥玉、碧瑱子》,《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23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年,第274—276页。

⑥ 杨士弘选编,张震辑注,顾璘评点,陶文鹏等点校:《唐音评注》下册“唐音遗响”卷六,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页。

⑦ 《大明一统志》卷三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4页。

⑧ 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肇域志》卷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2页。

⑨ 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肇域志》卷三八,第1653—1654页。

⑩ 《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09页。

《元史》记载云南会川产碧甸子,至元二十一年(1284)向朝廷输送了一千余块^①,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罢会川采碧甸子^②。会川,即今四川会理县。其地产碧色矿石,早在《汉书·地理志》就有记载:“会无(汉代名称),东山出碧。”^③《华阳国志》亦有相同记载^④。蒙元时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也提到建都(Gaindu)山中出产一种绿松石矿(Turquoise),极其美丽,储量大。除大汗下令之外,他人禁止采取^⑤。伯希和(Paul Pelliot)考证建都就是元代建昌路^⑥,与会川路南北毗邻^⑦,因此马可·波罗与《元史》的记载当为同一处矿区。然明代文献记载会川产石青、石绿^⑧,即蓝铜矿和孔雀石。矿物学研究也认为这里为铜矿区,出产孔雀石是合理的,而未见有绿松石^⑨。可见《元史》的“碧甸子”实为孔雀石,而非绿松石。

《大明一统志》、章潢《图书编》又载云南府安宁州土产碧瑱子^⑩。据矿物学研究,安宁境内的赤铁矿裂隙中确实产绿松石^⑪,可知安宁碧瑱乃绿松石。《大明一统志》同时还记载,云南孟养宣慰司亦土产碧瑱^⑫。孟养位于缅甸西北部,其地盛产翡翠,但从不是绿松石的产地,因此孟养碧瑱当为翡翠。

将文献记载与地质勘测结合分析后,便能发现古代之“名”与现在之“实”不能一一对应。尽管科学检测有助于判定事实,但一味依赖此手段,所得结论恐怕会与历史实情相去愈远,解释历史问题还应回到历史背景中去。对古人而言,他们

并不具备现代的检测技术,不可能精准地判定物质成分,只能通过表象来认识物质。颜色、质地和产地就是古人鉴别宝玉石的主要方面。据此原则再来思考古代绿松石之名,“甸子”“碧甸子”更多反映的是颜色上的差别。陶宗仪将“甸子”列于“回回石头”条目之下,表明他认为绿松石是波斯的土产,至少是以波斯所出为正品。与国产绿松石不同,波斯绿松石尤其是乃沙不耳绿松石以鲜亮的蓝色而著称。劳费尔的“甸”字来自于靛青的说法很有道理。陶氏之“甸子”乃蓝色石头之意,他以蓝色的波斯松石为正品,所以不但不用“碧”字,而且还称绿色的襄阳松石为“色变”。由此可知,不带“碧”字的“甸子”“靛石”等称谓,确为绿松石。文献记载也可印证:

《百宝总珍集》卷三“靛石”条:

靛石马价皆相类,颜色黑绿不直线。

青得美者颇人爱,碾成事件钱做看。

此石颜色好者,颇与马价相类。亦有深黑绿色者,亦有绿得美者,不甚直线。^⑬

《百宝总珍集》是南宋时的一部鉴宝书,其中对“靛石”的鉴定词明确反映了绿色非正品的观念。所谓“黑绿”者,是含有铁杂质的绿色松石,远不如蓝色松石优质,因此价格低廉。

又《岛夷志略》“班达里”条:

地产甸子、鸭忽石、兜罗绵、木棉花、青蒙石。^⑭

班达里,伯希和、考狄(Henri Cordier)认为是南印

① 《元史》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1页。

② 《元史》卷九四,第2377—2382页。

③ 《汉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④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18页。

⑤ A. 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6, p. 273.

⑥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tem “Gaindu”, vol. 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63, pp. 728—730.

⑦ 《元史·地理志》载会川路在建昌路南,二者同属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元史》卷六一,第1471、1474页。

⑧ 《大明一统志》卷七三,第1142页;章潢:《图书编》卷八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第25页。

⑨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319—320页;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439—440页。

⑩ 《大明一统志》卷八六,第1313页;章潢:《图书编》卷八九,第29页。

⑪ 栾秉璪:《古代绿松石释名分布特征及其原料来源》,《中国宝石》2004年第3期,第173页。

⑫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第1343页。

⑬ 《百宝总珍集》卷三,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第十二册,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8842页。

⑭ 汪大渊撰,苏继庾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页。

度大港 Fanderaina(或作 Fandaraina),即《元史》中的“梵答刺亦纳”^①;柔克义(W. W. Rockhill)考其地位于古里佛(Calicut)北 16 英里处^②;劳费尔指出印度本地不产绿松石,当地的绿松石贩自波斯^③。后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言班达里的甸子当贩自伊朗^④。可知班达里甸子为波斯绿松石。

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公玠家传》:

乌思藏昆葛锁南扎叭坚参已藏卜,乞袭天乘法王,贡年例方物外,私进厢嵌甸子无量度金佛一尊,画像释伽佛一副,舍利十颗。^⑤

藏、蒙人民甚爱绿松石,在佛像上镶嵌绿松石的传统延续至今。劳费尔曾言西藏绿松石来源之一为波斯,今天西藏博物馆所藏元代佛像身上美丽的蓝色绿松石证明其所言不虚。

以上论述可得出三个论断:一是不带“碧”字的名称确指绿松石,尤其是西域的优质绿松石;二是国产绿松石色泽偏绿,而多冠以“碧”字;三是带“碧”字的称谓,并不一直都是绿松石,有时亦指其他种类的绿色矿石。

二、域外绿松石产地

当今世界范围内,绿松石的产地遍布各大洲,尤其是美国后来居上成为绿松石出口大国之一。古代的绿松石产地有哪些?中古时代的波斯阿拉

伯语文献,详载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绿松石矿藏情况。10 世纪成书的佚名波斯语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记载呼罗珊地区的途思(Tūs)山中出产绿松石^⑥。10 至 11 世纪的波斯学者比鲁尼(Abū al-Rayhān Muhammad ibn Ahmad al-Bīrūnī)用阿拉伯语撰著的《珠宝录》(*Al-Jamāhir fī al-Jawāhir*),详述了乃沙不耳出产绿松石的情况^⑦。1195 年波斯珠宝商人内沙不里(Muḥammad ibn Abī al-Barakāt Juhārī Nayshābūrī)撰成第一部波斯语宝石书《内扎米珍宝书》(*Javāhir Nāma-i Niẓāmī*),记录了当时的四个绿松石产地:

呼罗珊境内乃沙不耳附近的一个叫巴伤(Bashūn)的村庄、花刺子模附近的阿儿答黑里(Ardakhra)、河中附近的忽毡(khujand)和突厥斯坦附近的巴儿思汗(Barskhān)。^⑧

13 世纪伊利汗国大学者纳昔刺丁·徒昔(Nasīr al-Dīn al-Tūsī),在其《伊利汗之珍宝书》(*Tansūkh-nāma-yi Ilkhānī*)中,列出当时出产绿松石的地点:

呼罗珊乃沙不耳附近、突厥斯坦的亦刺黑(Īlāq)附近、哥疾宁(Ghaznīn)和起儿漫。^⑨

再晚二十年成书的哈沙尼(Abū al-Qāsim Kāshānī)《奇珍异宝录》(*‘Arāyis al-Jawāhir va*

① 考狄言,将《元史》“梵答刺亦纳”、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Fandaraina”与《岛夷志略》“班达里”勘同的意见,得自于伯希和。Henri Cordier, *Ser Marco Polo, Notes and Addenda to Ser Henry Yule's Edition, Containing the Results of Recent Research and Discovery*, London: John Murray, 1920, pp. 119-120.

②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 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5/3 (1914), pp. 419-447.

③ Berthold Laufer, “Notes on Turquois in the East”,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13/1 (1913), pp. 1-5.

④ 汪大渊撰,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 256—257 页。

⑤ 焦竑:《献征录》卷五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22 页。

⑥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 D., 2d ed., tr. by V. Minorsky; ed. by C. E. Bosworth, London: Luzac & co., 1970, p. 103.

⑦ Muḥammad ibn Ahmad Bīrūnī, *al-Jamāhir fī al-Jawāhir*, ed. by Yūsuf Hādī, Tehran: Sharikat al-Nashr al-‘Ilmī wa-al-Thaqāfī, 1995, pp. 276-279.

⑧ Juhārī Nayshābūrī, *Javāhir Nāma-i Niẓāmī*, ed. by Īraj Afshār, Tehran: Mīrās-i Maktūb, 2004, pp. 127-128.

⑨ Nasīr al-Dīn al-Tūsī, *Tansūkh Nāma-yi Ilkhānī*, ed. by Madris Razavī, Tehran: Bunīyād-i Farhang-i Īrān, 1969, p. 76.

Nafāyis al-Atāyib),则记载了五个绿松石矿区:

呼罗珊乃沙不耳附近的一个叫巴伤的村庄、花刺子模附近的阿儿答黑里、河中附近的忽毡、起儿漫附近的山中[起儿漫和耶思德(Yazd)之间]、靠近突厥斯坦的亦刺黑附近。^①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13世纪以前绿松石矿藏主要分布在呼罗珊、花刺子模、河中地以及突厥斯坦这四个地区,13世纪后起儿漫成为第五个绿松石产区,且一直延续到16世纪^②。

三、传输路线

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域外绿松石出自哪些矿区?陶氏所记“回回甸子”即乃沙不耳所产绿松石,盖无疑义;但“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一语,颇令人费解。布莱特施耐德只说河西是“中古时期汉语对唐兀(Tangut)地区的称呼”^③,而未言它与乞里马泥的关系。劳费尔认为这是“出产于起儿漫,而在唐兀地区使用的绿松石”^④。夏湘蓉推断河西所产绿松石与波斯输入中国的乞里马泥纹理相似,所以陶氏将二者等同^⑤。宋岷认为起儿漫所产绿松石并未传入中国,陶氏仅从波斯商人处闻得其名及特征,遂将河西所产绿松石比附为起儿漫者。^⑥笔者认为要解释“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一语,需先解答两个问题:一是起儿漫绿松石是否传入中国;二是河西地区是否产绿松石。

第一个问题,前引波斯宝石书已表明13世纪

时起儿漫的绿松石矿藏得以开发。当时途经起儿漫的马可·波罗就记述了那里开采绿松石的情况:“该国山中出产一种名为‘绿松石’(Turquoise)的宝石,蕴藏甚富。人们在山中发现此矿,并从矿脉中将之掘取出来。”^⑦此外,哈沙尼的《珍宝奇异录》亦能找到相关记述:

现在,乃沙不耳的矿井变得破败、损毁,而无法产生效益。而起儿漫的矿藏被大量开采,运往契丹(Khitāy)之地,然并非佳品。^⑧

蒙元时代波斯文献中的“契丹”通常指中国或北中国,哈沙尼明确记载了起儿漫绿松石输入中国的事实,可以解答“乞里马泥”是否运来中国的问题。其中提到乃沙不耳矿井衰败的情况,在同时代的地理书《心之喜悦》(*Nuzhat al-Qulūb*)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虽然绿松石矿遍布多地,但以乃沙不耳矿为最优,因其所出绿松石质地优异,且易于开采。人们在发现绿松石矿的乃沙不耳山中开掘矿井,获得最优质的绿松石。乃沙不耳绿松石闻名于世。然近年来矿井中生出蝎子,人们因畏惧而停止了采矿。另有途思矿山,但其产量低于乃沙不耳。此外,不花刺(Bukhārā)与苏对沙那(Ushrūsanah)之间的山中亦出产绿松石。同样还有费尔干纳(Farghāna)和起儿漫,后者所产粗糙而不成熟,因而价格低廉。^⑨

以上两段材料反映出13世纪乃沙不耳绿松石矿山一度衰落,但名声不减;起儿漫绿松石崭露头

① Abū al-Qāsim Kāshānī, *‘Arāyis al-Javāhir va Nafāyis al-Atāyib*, ed. by Īraj Afshār, Tehran: Intishārāt-i Alma’ī, 2006, p. 67.

② 劳费尔在《东方绿松石考》中注释说:“1511—1512年成书的Jahja Ibn Muhammad al-Gaffari的矿物学著作中,记录出产绿松石的五个著名产地:乃沙不耳、哥疾宁、亦刺黑、起儿漫和花刺子模。”Berthold Laufer, “Notes on Turquoise in the East”, p. 1, n. 1.

③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1, p. 176.

④ Berthold Laufer, “Notes on Turquoise in the East”, pp. 56—57.

⑤ 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437页。

⑥ 宋岷:《“回回石头”与阿拉伯宝石学的东传》,《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第61—62页;《蒙元时期从波斯传到中国的自然科学》,高发元主编:《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⑦ A. 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p. 118.

⑧ Abū al-Qāsim Kāshānī, *‘Arāyis al-Javāhir va Nafāyis al-Atāyib*, p. 72.

⑨ 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 al-Qulūb*, ed. by G. Le Strange, Leyden: E. J. Brill; London: Luzac & co., 1919, pp. 195—196.

角,质劣、量大而薄利多销。可以说陶宗仪记载的这两个名字很具代表性,一个是最好、最有名的,一个是最多、进口量最大的。

第二个问题,河西是否出产绿松石。中国古代的绿松石产地鄂西北、陕东南和云南,皆非河西,所以“河西甸子”必不出此三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相继在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秦魏家墓地和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出绿松石珠^①,有研究者以此佐证河西出绿松石^②。但文物出土地与产地在逻辑上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此证据不可取。1981年新疆哈密黑山岭地区发现古代绿松石矿坑,有学者提出,哈密在古代曾一度归属沙州管辖,故此处所出绿松石可能就是河西甸子^③。宝玉石学家栾秉璈对哈密矿山实地考察后指出,该矿山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采,停采时间已很久远,不能判断何时废弃。但黑山岭位于河西走廊一侧,所出绿松石就是河西甸子^④。哈密古矿的发现一度成为河西甸子的确证。

但笔者认为,哈密绿松石并非河西甸子。首先,陶氏之“河西”非今日之“河西”。“河西”一词在历史上指代并不固定,荣新江、汤开建曾探讨“河西”概念在唐宋时期的演变^⑤。宋以后西夏崛起,“河西”遂常被用以指称西夏。《梦溪笔谈》载:“河西首领赵元昊叛”^⑥,《续资治通鉴长编》

称“河西谓夏国也”^⑦,其例甚多。蒙古灭西夏后,“河西”则用来指西夏故地及其人民。如《元典章》“种田纳税”条曰:“据〔不〕该纳丁税蒙古、回回、河西、汉儿并人匠。”^⑧此“河西”显然是指故西夏人。而哈密在蒙古征服前是一个独立政权,与西夏、畏兀儿并立^⑨。归附蒙古后,设立哈密力州。显然宋元时的哈密不属于河西。其次,地质学研究指出,哈密绿松石形态不规则,呈小块状,颜色绿色或微带黄绿色,远不及湖北、陕西所产^⑩。这与陶氏将河西甸子列于襄阳甸子之上的情况不符。再次,文献中亦未见有哈密出产绿松石的记载。因此“哈密绿松石即河西甸子”一说难以成立。

那么河西甸子与河西究竟有何关系?笔者认为“河西”不是产地,而是转销地。蒙古统一中国前,西夏盘踞河西两百余年,当丝绸之路之孔道。辽金两国与西域之往来,多取道漠北。而宋朝与西域往来,陆路必须通过西夏;商品贸易亦由西夏人把持。西夏输入宋朝的货物中,除当地土产外,更有来自其他地区的产品。《宋史·食货志》所载西夏与宋朝的贸易品中,如玉、麝脐、硃砂、翎毛诸物皆非西夏土产^⑪。有学者根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敕禁门》的记载指出,西夏为了能从丝路贸易中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在政策上对西域诸国给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29—62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57—96页;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21—448页。

② 丁昭富:《甘肃省宝玉石资源》,王实总编:《中国宝玉石资源大全》,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③ 任经午:《河西甸子与哈密绿松石》,《地球》1985年第1期,第30页。

④ 栾秉璈:《古玉鉴别》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4页。

⑤ 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82页;汤开建:《河西回鹘、河西党项与河西杂虏诸问题考释》,《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9—164页。

⑥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86—87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27页。

⑧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户部卷十“种田纳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44页。

⑨ 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人民出版社编:《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288页。

⑩ 薛秦芳:《吉祥成功之石——绿松石》,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⑪ 《宋史》卷一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63页。

予优惠^①。西夏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宋朝与西域贸易的商品中转地,西域商货经过多次转手,最终由西夏人贩卖于宋。因此宋人很可能只知道货物的购买地,而不知道货物的原产地。绿松石就是当时由西夏转卖给宋朝的商品之一。元代的一部生活指南类书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宝石鉴别部分引自宋代《宝货辨疑》,其内容多与前引南宋《百宝总珍集》相似,其中“碧靛”一条有“西夏者道地”一语,亦应出自宋人口吻。可知宋人是从西夏人那里购得绿松石的。宋人所说的“西夏碧靛”就是元人所说的“河西甸子”。

既然河西只是转运之地,那么它的绿松石又来自何处?前文已述13世纪以前绿松石主要产自呼罗珊和中亚地区。根据陶氏所述,河西甸子不是“文理细”的“你舍卜的”,而是一种“文理粗”的绿松石。据内沙不里记载,中亚忽毡地区的绿松石是除乃沙不耳之外最有名的,但其色泽不如乃沙不耳绿松石,质地也比较疏松,遇油污则易腐蚀,然其价格便宜,制成一种名为“TRMLH”的装饰品贩卖至突厥斯坦地区^②。从品貌上看,河西甸子更像是产自中亚的绿松石。宋元时周密《癸辛杂识》载:“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③刘迎胜指出“小回回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刺鲁人居地^④,当时哈刺鲁人主要为三支,分布在海押立(Qayaliq)、阿力麻里(Alimaliq)和讹迹邗(Özkent)一带^⑤。讹迹邗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东南缘,忽毡位于该盆地西南缘,亦刺黑大致在盆地西

北^⑥。费尔干纳凤以矿藏丰富而闻名,忽毡、讹迹邗和亦刺黑的绿松石矿应同出费尔干纳矿脉,所出绿松石的品质也应大致相同,都应归作“河西甸子”。13世纪蒙古征服时代,恰逢起儿漫绿松石矿的开发时期,此前,中亚出产的绿松石通过西夏贩卖到宋朝,被称作“西夏碧靛”或“河西甸子”;而蒙古统一中国后,汉地与西域的传统丝路重新打开。此时输入中国的绿松石,除产自中亚的“河西甸子”外,还有新开发的起儿漫绿松石。蒙古时代商路畅通,西域商货能够无阻碍地直抵汉地。元人从回回商人手中购得起儿漫绿松石,从他们口中听到“乞里马泥”之名。因乞里马泥与过去被称作“河西甸子”的绿松石品貌相近(皆为次等),而被元人视为一类,便有陶氏“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之语。其反映的正是丝路重开后,汉地对西域商品新旧认知上的统一。此即“乞里马泥即河西甸子”之合理解释。

此外,在传统丝路被阻断的宋辽金时代,航海技术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元代,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元《大德南海志》所记广州舶来品中有“碧甸子”^⑦,列于“宝物”类别下。同类下还列举了其他不少珍稀奢侈商品。可知此“碧甸子”当是一种比较珍贵的宝石,而诸如孔雀石、硅孔雀石这些国内多产、价值普通的石类则缺乏进口的必要性。而绿松石作为一种比较珍贵的宝石被贩来中国则十分合理。这些舶来的绿松石,最有可能出自起儿漫。一方面,13世纪起儿漫绿松石得到开采,出口量极大;另一方面,起儿漫的南部出海口忽里模子(Hurmuz)

① 参彭向前:《西夏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9—10页;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第20—22页。

② Juhārī Nayshābūrī, *Javāhir Nāma - i Niṣāmī*, pp. 129 - 130; Abū al-Qāsim Kāshānī, *‘Arāyis al-Javāhir va Nafāyis al-Atāyib*, p. 69.

③ 周密撰,王根林点校:《癸辛杂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4—65页。

④ 刘迎胜:《王仲德家族与元末江南古玩收藏》,《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2辑,2010年,第48页。

⑤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页。

⑥ 亦刺黑具体地望不确,巴托尔德考其范围大致在忽毡与塔什干之间。参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03页。

⑦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是当时波斯湾最重要的贸易港^①。起儿漫的货物具有从此港运出,贩往世界各地的便利条件。《岛夷志略》中所记印度港口班达里的甸子,应该就来自起儿漫。起儿漫绿松石开采出来,从忽里模子港出海,经印度转口后输入中国,这就是舶来绿松石的输入路线。相较宋代之“西夏碧靛”和元代之“河西甸子”,明代记载则言“碧靛子,出南蕃、西蕃”^②,此“南蕃”者即是指从海路输入中国的绿松石。

余 论

在考察古代绿松石向中国传输的问题时,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一种古代重要的世界贸易品,绿松石在向东、西方传输的过程中,其原产地一直不为人所重视。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

东西方对绿松石的称谓上,传到欧洲的绿松石被叫作“土耳其石”(turquoise),而传到中国的绿松石则具有“河西甸子”之名。土耳其和河西,皆非绿松石产地,而是贸易中转地。商品的名称以中转地之名传播,而原产地波斯、中亚的名字却被忽略了。这种现象不仅仅表现在绿松石身上,其他许多贸易品亦是如此。究其原因,这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够通畅有关。在世界范围内的长途贸易中,商品往往要经过多次中转才到达最终目的地;对目的地一方来说,很难了解商品的整个流动历程,只知道自己获得商品的渠道。因而造成传播者比生产者更具声名。这也提醒我们,对待历史文献的记载,不能仅闻其名而知其义,还要用动态的眼光,透过其名去探究背后的真实情况。

A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Persian Turquoise into China During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hen Chunxi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urquoise was a kind of gemstone, which was familiar to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owever, the name of this kind of stone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was not certain until the Song Dynasty.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record that could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urquoise in the name of “huihui dianzi” (回回甸子) was a book entitled *Records about Giving up Farming in South Village* (《南村辍耕录》) written by Tao Zongyi (陶宗仪) in the Yuan Dynasty. Besid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ontained the names of such stones as dian shi (靛石), bi dian (碧靛、碧钁、碧甸), bi zhen (碧瑱) and others which were similar to dianzi (甸子). Among scholars, there existed controversies about whether these names referred to Turquoise. Based on both Chinese and Persian – Arabic resources, and on the use of archaeological and mineralogical method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hinese equivalents of Turquoise found i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and its producing regions, and tries to draw up the route through which Turquoise came into China.

Key words: turquoise, Persia,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ransport route

(本栏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忽里模子有新旧两地。旧忽里模子今名“米纳布”(Mināb),是位于波斯湾岸上的一个港口,14世纪以前的史料中记载的忽里模子指的就是岸上这个旧忽里模子。14世纪初,约在1302年,由于受到伊朗大陆南下的外族侵扰,忽里模子王将其王国搬迁至波斯湾中一个名叫“哲龙”(Jarūn)的岛屿上,此岛后来便被称作新忽里模子。

② 曹昭撰,王佐增:《新增格古要论》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